

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文库

袁丁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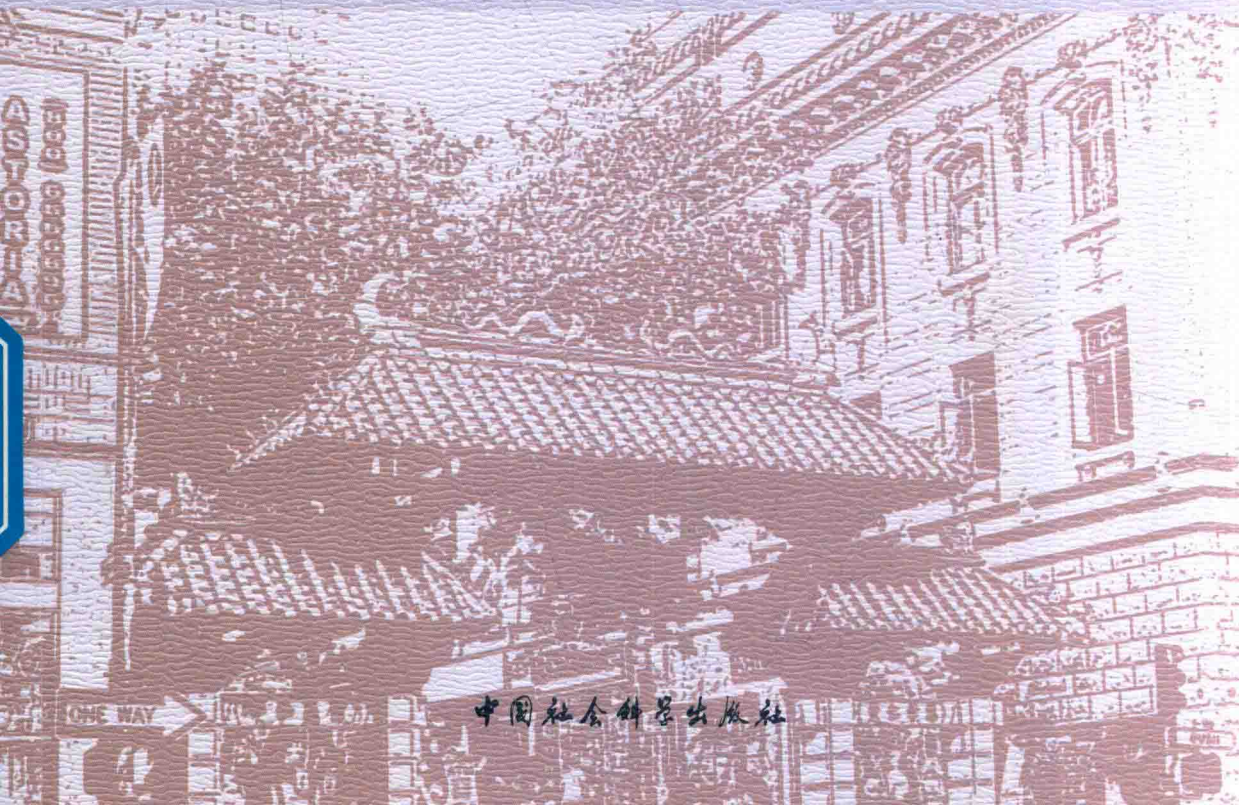
移民跨国实践中的 社会地位补偿

基于华南侨乡三个华人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

**Social Status Compensation through Immigrant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Emigrant
Groups from South China

黎相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山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文库

袁丁 主编

移民跨国实践中的 社会地位补偿

基于华南侨乡三个华人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

*Social Status Compensation through Immigrant
Transnational Practic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ree Emigrant
Groups from South China*

黎相宜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移民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基于华南侨乡三个华人移民群体的比较研究 / 黎相宜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3

ISBN 978 - 7 - 5203 - 3834 - 9

I. ①移… II. ①黎… III. ①移民—社会地位—研究 IV. ①D523.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000294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宋燕鹏
责任校对 李 剑
责任印制 李寡寡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明恒达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4.75
字 数 365 千字
定 价 98.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受中山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资助出版

序 一

王 宁

全球化是当代改变世界的一个最重要的趋势之一。它所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国际移民。相应地，国际移民也就成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个热门研究话题。其中，社会学者也对国际移民研究表现出浓厚的兴趣。但是，以往社会学界对于国际移民的研究，要么侧重移民在移出地的状况研究（包括移民动机研究和移民对移出地的后果研究，如移民汇款研究、移民对家乡的捐款研究等）；要么侧重移民在移入地的状况研究（包括社会适应研究、社会融合研究等）。把二者结合起来的的研究，还比较少见。之所以如此，一是因为研究成本太大，二是因为研究问题难以集中。但黎相宜的博士学位论文，不但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了，而且结合得很好。她的这一研究，是国际移民社会学研究中难得的出色成果，具有重要学术价值。也正因为如此，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获得 2014 年度“余天休优秀社会学博士论文奖”（社会学界博士学位论文的最高荣誉）。眼前的著作，就是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基础上修改、充实、完善而成的。我在此谨向她表示祝贺！

黎相宜博士之所以能完成这样一项高质量的学术研究，首先在于她的敬业和学术热忱。一般的博士生在写博士学位论文的过程中，往往只选择一个田野点做研究。她则先后到三个田野点做深入的田野调查，包括江门（广东）、福州长乐（福建）和海南。不但如此，当她意识到需要了解移民到了国际移民目的地以后的状况时，她不辞辛

苦，远赴美国，到华人聚集的唐人街进行田野调查。这使得她的田野调查资料不但覆盖了移民在移出地的状况，而且也包括移民在移入地的状况，从而使得她能够以更广阔的视角呈现出国际移民的完整图画。就其研究工作量来说，她的博士学位论文所耗费的田野工作量，不是一般博士学位论文可以比拟的。没有对学术的执着、热爱和坚持，是很难取得这样的杰出成就的。

所幸，她的辛苦投入带来了回报。在她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基础上整理出来的几篇文章，先后发表于《社会学研究》和一些重要的国际学术期刊上。而她对于国际移民的消费社会学研究，成为国际移民研究领域一个新领域和新课题。而她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不但以其观点的新颖性在国内外学术界令人耳目一新，而且也引起了国内外同行的重视。她把华人移民的捐款研究放在跨国主义实践视野下加以分析，从移入地和移出地的对比情形中分析华人移民的捐款行为，并用“地位补偿”的理论范式来概括这一行为。这一观点是重要的学术创新。她还分别探讨了传统道义型跨国实践、多元交换型跨国实践与衰落型跨国实践三种类型，并分析社会地位补偿对于跨国模式与发展趋势的影响。她还进一步揭示了华人移民的“社会地位的季节性表达”的特征。

黎相宜博士的另外一个幸运，是得到国际知名的移民研究的大家周敏教授的指导。在读博期间，黎相宜提出要研究移民问题。我是这一领域的外行，但我同意她做这一方向的研究，因为当时周敏教授正在我们系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我便顺理成章地邀请周敏教授来共同指导黎相宜的博士学位论文研究。周敏教授的加盟，弥补了我在移民研究领域的外行所造成的指导能力的不足。更重要的是，当黎相宜到美国做田野调查时，周敏教授也给予她热心的帮助和指导。

黎相宜博士所取得的这些学术成就就是她自己努力的结果。她已经在学术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以后的路还很长，还需要继续努力。我相信，她会在学术领域大有作为的。期待她今后有越来越多的高质量学术产出。

2018年6月6日
于中山大学南校园

序 二

周 敏

近半个世纪以来，全球化日益激烈地冲击着民族国家边界。国际移民潮的流向也呈现多元化的趋势，既有发展中国家向西方工业发达国家流动的传统模式，也有发展中国家之间流动的新模式，甚至还有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流动的模式。双向的跨国流动也日趋显著和频繁。在这种背景下，学术界的国际移民理论出现了明显转向，主要标志是由以单一民族国家和基于西方发达国家为移居地为分析框架的古典国际移民理论过渡到移民跨国主义理论。跨国迁移不只是移民个体的身体移动以及由此发生的空间位置变化的过程，可能还涉及种族、阶层、性别等社会因素的重构。传统国际移民理论更强调移民在物理空间以及社会文化心理上的“连根拔起”，假定移民在跨越地理空间的同时也跨越了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社会文化边界。而“跨国主义”命题则看到了个体在结构限制下的能动性，更强调这些移民以跨国的方式不断建构有关特定族群的身份认同以及寻觅在不同跨国空间下的社会定位。

本书作者黎相宜正是在上述国际移民及跨国主义理论的基础上展开其研究的。以往的海外华人研究只是将祖籍国的中国作为移民融入移居国的一个信息背景，而中国的侨乡研究则往往忽略了移居国之间的差异而侧重在移民对于祖籍国家乡的投入与参与上。这两种方法并不能够成功地将移民的祖籍国以及移居国两地的背景纳入一个整体的

社会场域来分析。黎相宜则为了超越简单地从移居国或祖籍国一方的情境研究移民，她采用跨国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将其研究对象——华人移民放置在跨国社会场域的所有地点来研究。在几年的时间里，黎相宜不辞劳苦，持续奔波于广东、福建以及海南侨乡，对源自这些不同家乡的国际移民及其祖籍地进行了深入的田野调查。她还来到美国跟随我进行学习和调研。在美国的短短半年时间，她在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旁听了我和我的同事教授的“亚裔移民及其第二代”“美国亚裔研究”“美国国际移民研究”等课程并做了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梳理。她还利用业余时间对上述亚裔和华裔移民群体的族裔聚居区、社团组织以及生活情况进行了详细与深入的访谈和实地观察。她在国内外的田野调查期间，充分表现出了刻苦、认真和执着的专业精神以及扎实、严谨、细致的思考和分析综合能力。此书正是她多年研究与积累的成果表现。

在本书中，黎相宜从社会学的角度提出“社会地位补偿”的范式，运用跨国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分别从江门、福州及海南地区抽取坎镇、官镇及文镇三个侨乡以及由此移出的国际移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比较与分析了在变动世界体系之下，这些国际移民是如何主动地重构社会身份与协商所属社会阶层，并以其丰富多元的跨国实践来抵抗现有世界体系给他们个人所带来的原子化与边缘化。本书主要探讨下述几个中心研究问题：国际移民为什么会产生社会地位补偿的需求？他们的社会地位补偿需求由谁来满足？社会地位补偿机制如何影响移民的跨国实践？什么样的跨国实践最能实现社会地位补偿？作者首先指出移民之所以产生社会地位补偿的需求是与移民不仅与移民个体的社会经济背景有关，还与移出地和移入地的社会环境有着密切关系。坎镇、官镇及文镇移民在迁移前的社会地位基本相似，以社会经济背景底下的非熟练劳动力为主。坎镇和官镇移民主要流向北美发达国家。坎镇移民分布在美国和加拿大各大城市，而官镇移民较为集中在美国东部的纽约地区。相比之下，文镇移民则大多迁移至东南亚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祖籍国与移居国在世界体系中的国家阶序存在位差，这三个移民群体在迁移过程中经历了不同的社会阶级地位变

动（脱位、失位与复位），因而当他们返乡实现“跨国阶级划界”时出现了不同的结果：坎镇与官镇移民通过跨国实践提高了自身的社会地位，而文镇移民却无法在侨乡实现社会地位补偿。另外，由于受到移民在移居地的平均收入与祖籍地的平均收入的比率的影响，这三个移民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地位落差与社会地位补偿成本也呈现较大差异。其次，社会地位补偿之所以可能还与其供给情况有关。坎镇、官镇地方政府出于获取经济利益与政治支持的二元需求，积极为移民提供社会地位补偿；而文镇海外乡亲远不能满足文镇地方政府的经济和政治需求，地方政府对移民的冷淡态度，也进一步抑制了文镇移民进行跨国实践的热情。同时，坎镇地方社会的跨国宗族网络源源不断地为回乡移民提供声誉补偿。官镇地方性网络的密度与强度比坎镇更高，因而对于移民跨国实践的制约更强。文镇的地方组织与网络则较为松散，难以发挥补偿功能。此外，由于迁移历史及移居国政策的差异，三个移民群体的海外离散社会在密度及规模均呈现差异。坎镇与官镇移民的族裔聚居区及社团基本还是一个以移民为主体的社区与组织形态，其所形成的社会网络密度高，与祖籍地联系较多，更易于提供社会地位补偿；而文镇移民的海外离散社会基本实现了“在地化”，其族裔社区与社团组织网络松散且与家乡联系较少，难以形成促进跨国实践的积极因素。此外，本书还探讨了传统道义型跨国实践、多元交换型跨国实践与衰落型跨国实践三种类型。其中坎镇移民由于在迁移过程中面临声誉地位下降，他们较看重声誉补偿，由此形成了以社会文化馈赠为主的传统道义型跨国实践。官镇移民则在迁移过程中面临声望、经济地位甚至是政治地位的同时下降，因而他们的社会地位补偿类型较为多元，形成了包括社会文化馈赠、经济投资、跨国政治实践在内的多元交换型跨国实践。文镇移民则由于实现了社会阶级复位，其补偿需求与供给大量下降，他们的跨国实践出现衰落趋势。

本书的实证分析和理论诠释对于推进国际移民理论以及跨国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但是我认为本书的价值不仅限于此。黎相宜试图通过对国际移民及其跨国实践的研究，对原有知识框架和传统的理

论预设进行了反思与修正。“社会地位”历来是社会学的经典话题。传统的地位理论预设了一个客观存在的社会空间，假定社会资本积累的过程发生在一个相对同质与静态的社会系统里。作为全球化的产物，跨国实践已经成为国际移民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模式，由此引发了学界对传统移民社会学理论的深刻反思。本书跳脱单一民族国家（祖籍地或移居地）框架的束缚来分析动态的迁移个体的多重位置与身份形塑。由于跨国迁移带来大量的机遇和挑战，移民可以不再遵循“生于斯，老于斯，死于斯”的模式，而是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在祖籍国与移居国的边缘性杠杆作用，在两个社会和文化中持续利用由二元生活产生的经济和政治机会，充分实现“社会地位的季节性表达”。跨国实践作为迁移个体应对世界体系的微观实践，通过跨国空间将消费价值剩余转移的方式，使国际移民在家乡实现了消费的社会价值兑现。而这种“消费反哺”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生产领域的跨国流动给祖籍国与移居国带来的资源不平等分配的冲击，也为移民输出地区提供了发展的机遇与动力，使其有机会走进世界体系的中心，并潜移默化地改变了祖籍国与移居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利益格局，也改变了国际移民进行社会流动的客观条件和机制。

本书主要是比较了来自不同祖籍地与移居地的较低社会经济背景的华人移民的跨国实践，其社会地位补偿机制解释只是研究移民跨国实践的其中一个新方向，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移民的跨国实践模式和类型。近年来的大量研究表明，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移民也积极地参与跨国实践。那么本书所阐释的社会地位补偿机制是否能够运用于解释较高社会经济背景的移民的跨国实践呢？这些问题则有待更深入的比较研究与理论探讨。

2018年4月7日

美国洛杉矶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一节 跨国主义模式的兴起	(1)
第二节 国际移民研究的新视角：回顾与反思	(3)
一 分析视角：民族国家还是跨国主义？	(3)
二 流动性质：物理空间迁移还是社会文化跨界？	(7)
三 移民主体：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与阶层流动	(9)
第三节 社会地位补偿机制：概念与理论	(11)
第四节 跨国多点民族志：资料与方法	(15)
第五节 文本叙述：结构与风格	(21)
第二章 世界体系变动之下的移民实践与跨国通道	(23)
第一节 世界体系扩张、移民潮开启与跨国通道形成	(24)
第二节 两极对峙、移民潮回落与跨国通道萎缩	(29)
第三节 世界一体化、移民潮重启及跨国通道恢复	(33)
第三章 从“捱世界”到“叹世界”：坎镇移民的传统道义型跨国 实践	(40)
第一节 社会地位补偿需求的形成	(42)
一 “捱世界”：社会阶级脱位	(43)
二 “叹世界”：跨国阶级向上流动	(53)
三 社会地位落差的形成与廉价的社会地位 补偿成本	(72)

第二节 持续的社会地位补偿供给	(77)
一 “谦卑”的坎镇地方政府	(77)
二 低密度网络的坎镇地方社会	(89)
三 弱控制的海外离散社会	(104)
第三节 传统道义、声誉补偿与社区福利实践	(119)
一 “馈赠—补偿”的道义传统	(120)
二 “凉亭事件”：道义关系的断裂	(125)
三 改换门庭：重建道义关系	(127)
第四章 从“偷渡者”到“美国客”：官镇移民的多元交换型 跨国实践	(133)
第一节 社会地位补偿需求的高涨	(135)
一 “黑着”：社会阶级失位	(135)
二 成为“美国客”：跨国越级向上流动	(153)
三 社会地位落差的扩大与低廉的社会地位 补偿成本	(175)
第二节 积极的社会地位补偿供给	(177)
一 矛盾的官镇地方政府	(177)
二 高密度网络的官镇地方社会	(184)
三 强控制的海外离散社会	(190)
第三节 互惠交换、复合补偿与多元跨国实践	(203)
一 声誉补偿与地位竞赛	(204)
二 利益交换与经济互惠	(210)
三 政治利益共同体的形成	(213)
第五章 从“过番”到同化：文镇移民的衰落型跨国实践	(241)
第一节 社会地位补偿需求的下降	(242)
一 从“落叶归根”到“落地生根”：社会阶级复位	(243)
二 “变穷”的“南洋客”：跨国阶级向下流动	(253)
三 社会地位落差的缩小与“昂贵”的社会地 位补偿成本	(257)

第二节 弱化的社会地位补偿供给	(264)
一 “不缺钱”的文镇地方政府	(264)
二 松散的文镇地方社会	(277)
三 原子化的海外离散社会	(288)
第三节 关系弱化、低度补偿与跨国实践衰落	(296)
一 传统道义的没落	(296)
二 交换关系难以形成	(306)
第六章 比较视野下的跨国实践与地位补偿	(312)
第一节 为什么需要社会地位补偿：移民的社会 地位流动	(312)
一 社会阶级的脱位、失位、复位	(313)
二 跨国阶级划界	(314)
三 社会地位落差与补偿成本	(316)
第二节 谁来满足需求：社会地位补偿供给的 路径依赖	(319)
一 侨乡地方政府：“经济发展”与“爱国统战”	(319)
二 侨乡地方社会：“民间口碑”	(322)
三 海外离散社会	(323)
第三节 社会地位补偿类型与跨国实践模式	(326)
第七章 结论与讨论	(330)
第一节 社会地位补偿何以可能？	(331)
第二节 社会地位的季节性表达	(335)
第三节 全球链下的消费价值剩余转移	(341)
第四节 未来展望	(345)
参考文献	(348)
致谢	(380)

第一章 导论

在当今世界上，一切都处于持续不断的运动中，越来越多人终生处于不断的迁移、变化和流动之中。“漂泊”的心态所折射的恰恰是不断加剧的全球化效应。

——彼得·伯格等 (Berger et al. , 1973: 184)

第一节 跨国主义模式的兴起

国际移民作为全球一体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不同民族国家在经济、政治以及社会文化联系上越来越紧密的产物。据联合国的不完全统计，2017年国际移民总数已达到2.58亿，比2000年增长了49%。移民占全球总人口比例也从2000年的2.8%增长到目前的3.4%。^① 当今世界已进入“国际移民时代”（转引自李明欢，2012）。

由此引发的跨国流动也颇为引人注目。随着经济的全球化，资本、商品、信息的流通以及观念、文化乃至人的流动并行不悖，全球化正无情地冲击着许多民族国家的边界。在这种背景下，国际移民理论也由以单一民族国家为分析框架的古典国际移民理论过渡到移民跨

^① 参见 UN DESA: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port”, 参见 <https://www.un.org/development/desa/publications/international-migration-report-2017.html>。

国主义理论。移民跨国理论突破了传统研究模式，给国际移民研究领域带来新的发展。在肯定跨国主义的理论贡献的同时，需要指出移民跨国理论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没有得到解决。以往学者们大多把精力放在了谁在参与、在多大范围内参与、如何参与以及参与的后果等问题上，却忽略了不同类型的移民在迁移形态、社会经济背景上所发生的多样性变化及其对于跨国实践的影响。移民跨国理论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和假设的同时，也限制了这些研究在探求事实真相上的步伐。

我认为上述众多研究者往往只是笼统地就跨国主义及其相关概念的定义，跨国实践的主体、边界、模式以及所带来的后果等问题进行争论。虽然以往也有研究证明，移民的人力资本（例如教育、职业技能、公民身份）及其他人口特征（例如年龄、性别以及婚姻状况）都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跨国实践的形式及规模，而且移民群体在移居地所处的劣势社会地位（比如在移居地受到种族歧视以及排斥）也会给跨国实践带来影响。甚至，还有学者进一步指出，移民在日常居住的移居地的融入程度有限使得他们愿意与祖籍国保持跨国联系（Basch et al. , 1994; Gold, 2001; Guarnizo et al. , 1999; Light et al. , 2002; Zhou & Tseng, 2001; Diaz - Briquets & Weintraub, 1991; Itzigsohn, 1995; Goldring, 1996; Popkin, 1999; 蔡禾、王进, 2007)。但这些研究也存在两点问题：首先，移民的人力资本积累并不是发生在一个相对同质与静态的社会系统里；其次，移民的社会地位在不同社会空间中存在不一致性。以往研究很少能完整地考虑祖籍国与移居国在世界体系中的位置、移民在迁移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地位变动、移民在不同空间的社会地位不一致性对于跨国实践的影响。

本书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试图通过跨国多点民族志的方法，分别从江门、福州以及海南地区抽取坎镇、官镇及文镇的移民群体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在当代这种相对变动的世界体系之下，这三个华人移民群体是如何在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时间中重构新的社会身份与协商所属社会阶层，并以其丰富且多元化的跨国实践来抵抗现有世界体系给个体所带来的原子化与边缘感。这三个移民群体尽管遵循不同的迁移路径、来自不同祖籍地以及流向不同移居地，但大多为熟练劳动力，

与技术、投资移民有所不同。他们的跨国实践不仅与个人出国前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关，还与祖籍国和移居国在世界体系中的政治经济地理位置、移民群体在移居地的社会境遇以及在不同社会文化空间下的社会地位不一致性有着密切关系。与此同时，侨乡的地方政府和民间社会出于经济发展、政治统战和传统复兴等各种考虑也对移民跨国实践产生不同的影响。另外，移民的海外离散社会的规模、网络密度、与本地社会整合的程度等因素也制约其跨国实践的实现。上述宏观、中观与微观层面的各种因素产生交互作用，形成一种特殊的机制——社会地位补偿机制——来影响移民跨国实践（黎相宜、周敏，2012）。

本书要具体探讨的是以下几个有关问题：跨国移民的社会地位补偿何以可能？他们为什么会产生社会地位补偿的需求？他们又是如何通过跨国实践实现社会地位补偿？由谁来满足这种社会地位补偿的需求？社会地位补偿机制对不同祖籍地和移居地的移民群体的跨国实践模式有着怎样的影响？

第二节 国际移民研究的新视角：回顾与反思^①

当今，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以既不是“落地生根”又不是以“落叶归根”的方式，不断建构着自身的身份认同、同时实现着社会融入。如何理解这种跨国实践？恐怕要从国际移民理论分析视角的转变及其对迁移性质与移民主体性的影响回溯。

一 分析视角：民族国家还是跨国主义？

关于国际移民，人们总是好奇这些移民为什么会迁移、迁移如何持续、他们如何融入。因此，在国际移民研究领域，最先发展起来的古典国际移民理论主要根据移民输出地到移民输入地，围绕移民动

^① 本节内容曾以《国际移民研究的理论回顾及未来展望》为题发表于《东南亚研究》2012年第6期，第二作者。

因、移民过程与移民结果三大研究领域而展开 (Lewis, 1954; Sassen, 1988 & 1991; Piore, 1979; Massey et al., 1993 & 1994; Taylor, 1986; Myrdal, 1957; Massey, 1990; Park, 1928; Glazer et al., 1970; Portes, 1995; Portes & Zhou, 1992 & 1993)。古典国际移民理论主要解释国际移民是如何产生、发展并最终融入移居地社会的, 认为国际移民的迁移是从祖籍地到移居地的单向度、直线性流动与社会适应的过程。

海外华人与侨乡研究也受到上述理论框架的影响。以往海外华人研究只是将母国作为移民融入移居国的一个信息背景, 而中国内地的侨乡研究则往往忽略了移居国的差异, 只侧重在移民对于祖籍地的投入与参与上。这两种的方法并不能够成功地将移民的祖籍地以及移居地的背景纳入一个整体的社会场域来分析 (Mazzucato, 2008)。无论是移居地还是祖籍地的研究都沿用了民族国家的政治界限去分析华人移民。前者把华人移民视为要融入本土社会的被管制客体, 而后者则视其为外来力量, 可帮助本地社会发展, 但华人移民自身的主体性反而被忽略了 (参见林霭云, 2006)。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日益加剧, 古典国际移民理论过于侧重通过移民的祖籍地或移居地来讨论移民问题, 这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研究框架已经无法完全解释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人口流动。国际移民作为全球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唯有将国际移民置于全球化的大系统之内, 方能准确认识其社会影响, 正确评价其未来走向 (李明欢, 2010 & 2010)。更为关键的是, 国际移民的迁移与适应模式已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很多实际现象显示, 移民在移居国定居或是保持着与祖国的紧密联系的情况都不是很明显。越来越多的国际移民在移居地建立起新家庭、新社区的同时, 与祖籍地保持着频繁而有序的金融、产业、贸易、文化、政治等活动。这种在祖籍地与移居地之间往返的生活方式不仅满足了移民家庭在两地的经济需求, 也降低了移民无法完全融入移居地主流社会所产生的不适应感和困扰 (参见 Glick - Schiller et al., 1995; Grasmuck & Pessar, 1991; Jacoby, 2004; Zhou & Lee, 2013; Glick - Schiller & Fouron, 1999)。